



# On the Rise of “Modern Sociology of the Chinese School” :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volvement of Fei Xiaotong’s Sociological Thoughts in the 1930s

Ding Yuanzhu

**Abstract:** The idea of “modern sociology of the Chinese School” as an independent local branch of sociology was first proposed by the British anthropologist Bronislaw Malinowski in his “Preface” to Fei Xiaotong’s book *Peasant Life in China*, adapted from Fei’s PhD thesis and published in 1939. In the 1930s, some Chinese sociologists, with Wu Wenzao and Fei Xiaotong at their vanguard, were conducting from the community-research approach systematic field studies in their endeavor to find a way out for the future of Chinese society. Malinowski’s attitude as expressed in his “Preface” was a recognition of their efforts. Modern Chinese community research originated with field works investigating into the status quo of culture, economy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case studies of villages carried out in provinces such as Guangxi, Shandong, Jiangsu, Shanxi, Fujian, and some areas dwelled mostly by ethnic minorities. This kind of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different from other surveys of a more general sense, is “new” in its insistence o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sociological studies for the revelation of basic laws and structures of human society, in its adherence to on-site observat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its striving to know a society’s current state through a knowledge of the vicissitudes in its past. It is on these principle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ological study is laid. Since the “Chinese School” applied the methodology of anthropology and community research to the study of modern society and its “civilized men”, especially as a result of the tribulation the Chinese people suffered for about a whole century in con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urageous struggle they put up in response, the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School was a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vention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since Fraser and Malinowski with its focus on the study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thropology brings to bear their studies on a series of issu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such as language, race and rac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gender, family and marriage, social classes and inequality, global economy, politics and power religion, health and disease, etc.,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which “modern sociology of the Chinese School” plays a very important intermediary and bridging role.

**Keywords:** Modern Sociology of the Chinese School, Fei Xiaotong, Field Research

**Author:** Ding Yuanzhu earn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sociology from Shandong University in 1988, and took his doctorate in soci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1991. He was a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from 1999-2001. He worked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Peking University before moving on to a position at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acro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He is now a professor at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a guest professor with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His field of expertise chiefly covers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 public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ory and Methods in Community Research*, *Social Work: Classification,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Management of Society’s Development*,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Strategy and Basic Countermeasures*, *Strategies of China’s Social Institution Reform and Countermeasures*, *Confrontation and Run-in-Public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and *The Logic of Society*.

## “現代中國社會學派”興起之考察

### ——兼論費孝通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思想軌迹

丁元竹



[摘要] “現代中國社會學派”這一稱謂，是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於1938年10月為費孝通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民的生活》撰寫的“序言”中，對以吳文藻、費孝通等為代表的中國社會學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用社區研究方法開展的系統性實地研究活動和對中國社會及其出路開展探索的一種概括。現代中國社區研究起步於實地中的個案研究，始於“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發起的對廣西、山東、江蘇、山西、福建等地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經濟、教育實地調查。這種“社會學調查”與一般的“社會調查”有所不同，它強調社會學的專業性，發現社會的基本規則和原理，堅持體察和

定性分析，通過社會變遷瞭解社會現狀，進而奠定了現代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基石。由於“現代中國社會學派”把人類學和社區研究的方法用於研究現代社會——“文明人”，尤其是由於全球化導致的中國在一個世紀中的磨難與奮爭，從而突破了自弗雷澤到馬林諾斯基以來人類學專注“土著民族”的研究方法和風格。從弗雷澤、馬林諾斯基到“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再到當代人類學，是一個人類學、社會學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不斷擴大、不斷創新的過程。在二十一世紀，人類學聚焦全球變遷和全球化轉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語言、種族和種族主義、民族和民族主義、性別、親屬家庭和婚姻、階級和不平等、全球經濟、政治和權力宗教、健康和疾病等等，“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在這個進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中間人和過渡者的角色。觀察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科建設，也可以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和費孝通的思想軌迹中看到其蹤影。

[關鍵詞] “現代中國社會學派” 費孝通 實地研究

[作者簡介] 丁元竹，1988年在山東大學獲社會學碩士學位，1991年在北京大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1999—2001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做高級訪問學者，先後任職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現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社會發展政策、公共政策、發展戰略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社區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志願活動研究：類型、評價與管理》《社會發展管理》《中國社會建設戰略思路與基本對策》《中國社會體制改革戰略與對策》《交鋒與磨合——公共服務提供中的社會關係》《社會的邏輯》等。

## 引言

“現代中國社會學派”這一稱謂，是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於1938年10月為費孝通（1910—2005）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譯為《江村經濟》）撰寫的“序言”中，對以吳文藻（1901—1985）、費孝通等為代表的中國社會學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用社區研究方法開展的系統性實地研究活動和對中國社會及其出路開展探索的一種概括。

馬林諾斯基在“序言”中寫道：“費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內容，向我們揭示了現代中國社會派的方法基礎是多麼結實可靠。”<sup>①</sup>他之所以得出如此結論，是因為在1936年，時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吳文藻訪問了倫敦經濟學院，馬林諾斯基在與吳文藻的交流中得知，“中國社會學界已獨立自發地組織起一場對文化變遷和應用人類學的真正問題進行學術上的攻關”<sup>②</sup>。基於此，馬林諾斯基纔把這個正在“攻關”的群體稱為“現代中國社會學派”。這也是後輩學者談及費孝通及“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的由來。

本文的目的是想對“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產生、發展進行詮釋，並且希望通過梳理這段社會人類學的歷史，能對當前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國際話語體系有所啓迪。

## 一 “現代中國社會學派”：時代背景與學術共同體

### （一）“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學術研究行爲的兩根支柱

在十九世紀，世界許多國家遭受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和蹂躪，因此，學習西方、擺脫壓迫就成為這些國家/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選擇之一。對於這一點，西方學者也有類似看法：“面對亡國滅種前途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由改良陣營轉向了革命陣營。”<sup>③</sup>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歷史中的革命時代。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和科學運動，喚起了中國人對民族和國家發展道路的探索；這種探索發展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經由表層討論進入其內部分析和研究，由理論探索轉變為改良、改革和革命行動。換句話說，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選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學以致用”的道路，既可以從那個時代面臨的挑戰和變革中找到它的緣由，又可以從中國社會的文化及其結構中看到它的影子——面對外敵入侵和民族磨難，有血性的中國學者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衝擊和危機感。而“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的世界觀、思想風格、理論和方法的形成，也正是近代以來國際上的各種經濟、文化、社會思潮進入中國，與中國文化發生衝突並融合的結果。對此，晚年費孝通看得比較透徹，他寫道：“中西文化碰了頭，中西文化的比較，就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他們圍繞着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的社會變遷，爭論不休，可以說至今還在繼續中。”<sup>④</sup>這個“碰了頭”，首先是“東西文化觀”，接下來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中國文化出路、中國經濟建設的道路；這種爭論繼續的背後，是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推動民族復興的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百年現代化思潮的演變，一直是圍繞民族復興這一主綫——中華民族復興與文化革命的命題及其討論從來就沒有分開過。

中國社會及其文化背景，僅僅構成了“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學術研究行爲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還需要從“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學術研究的環境及變動中去尋找。五四運動至1927年大革命期間，各種激化的社會矛盾，使蛻變中的中國社會陷入深深的危機，尋求中國的出路幾乎成為每一個先進中國人的共同要求。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也喚起了先進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熱情，他們冷靜地思索着中國的未來和個人的前途。五十年後，費孝通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

①② 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第4、3頁。

③ [美]斯圖爾特·R.施拉姆：“導論”，《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田松年、楊德譯，第8頁。

④ 費孝通：《費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第16卷，第56頁。

1928年，我畢業於東吳附中……這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的一年，我當時在中學讀書，跟着許多進步同學鬧學生運動。北伐軍進蘇州後，我參加了當地民報副刊的編輯工作。革命的潮流激起了像我一樣的許多青年的熱情和憧憬。但曇花一現，革命失敗了。許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我安不下心，坐不安了。我想，醫生固然能治病，病源卻不在個人而在社會，治病人得先治社會，學醫既然先學生理，治社會也得先學點社會原理，這樣，我纔轉學到燕大開始學社會學的。<sup>①</sup>

大革命深深地影響了費孝通的世界觀。這場革命是費孝通成爲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開端。二十世紀後期，在與美國人類學家巴斯特納克（Burton Pasternk）的談話及在許多場合，他都認爲，1927年的大革命是他生平事業的轉捩點。從此，他與千千萬萬先進的中國人一道，轉向了對中國社會出路的求索。

## （二）從全盤吸收西方文化轉向對中國問題的深入研究

中國接受西方影響的過程始於十九世紀中葉，並持續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但五四時期是一個巨大的轉捩點，從此以後，一切都發生了新的變化”。<sup>②</sup>這個“新的變化”，就是如何處理西方思想與東方文化的關係。以反全盤西化爲標誌的新啓蒙運動便是在這樣的年代發生的。新啓蒙運動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展開了如何對待西方社會科學和文化的討論。胡適（1891—1962）、陳序經（1903—1967）代表了“全盤西化派”，潘光旦（1899—1967）、吳景超（1901—1968）則代表了“反全盤西化派”。兩派的鬥爭表面上看是如何對待西方文化問題，實質上是如何看待各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規律問題，即承認不承認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特點和自己的發展道路。

“反全盤西化派”的主將之一潘光旦，對費孝通的影響至深。1930年，費孝通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當時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文藻、楊開道（1899—1981）、許仕廉（1896—？）等人與清華大學教授陳達（1892—1975）、吳景超、潘光旦等人關係密切，而他們中間的聯繫主要靠兩系的學生，如費孝通、楊慶堃（1911—1999）、林耀華（1910—2000）、黃迪（1910—？）等人，費孝通的學士論文《親近婚俗之研究》還得到了潘光旦的指導。1933年畢業後，費孝通又考取了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研究生，之後與潘光旦接觸甚多，差不多“每個禮拜總有機會見面，交談”，從中“看他們怎麼生活，如何待人”；從潘光旦身上“不僅學到了做學問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這一方面的道理”。<sup>③</sup>潘光旦對民族問題有着深刻的研究，當時就曾寫下《再談種族爲文化原因之一》<sup>④</sup>《當前民族問題的另一種說法》<sup>⑤</sup>等一系列文章。潘光旦認爲：“民族的根本問題，具體言之，是一個人口的位育問題。”<sup>⑥</sup>費孝通說：“我深刻體會到在他們腦子裏經常在想的是怎麼把中國搞好，人民富起來，別的都是次要事情。我相信這幾位老師做學問的主要目的還是在這個地方。這是他們做人的精神支柱。”<sup>⑦</sup>

如果說，“全盤西化”與“反全盤西化”的鬥爭打破了自五四運動以來隱含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假定——世界發展會趨於統一的模式和西方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的話，那麼，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的學術上的論戰則表明：中國社會科學界已經開始覺醒，從現實問題和現實發展來探索研究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這些論戰對費孝通學術思想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儘管他對這場爭論中的方法及方法論問題持有不同看法。1937年初，在致鄭安侖（1910—？）的信中，費孝通嚴肅地批評了中國社會科

① 費孝通：《從事社會學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102頁。

② [美]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第3頁。

③⑦ 費孝通：“在‘已故燕大、西南聯大社會學教授學術成就研討會’上的講話”，《社會研究》4（1988）。

④ 潘光旦：“再談種族爲文化原因之一”，《時事新報·學燈》，1927-11-10。

⑤ 潘光旦：“當前民族問題的另一種說法”，《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5-06-05。

⑥ 潘光旦：“民族的根本問題”，《大公報·華年》，1936-03-14。

學研究中的“問題式”方法和利用外來理論套用中國社會的傾向：

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因為外來書籍文字的輸入，以為靠了些國外學者在實地所得的知識，所以用來推想中國的情形。他們其實假定着文化到處都是相同的原則，而這些原則本身，在我們看來，就是需要加以事實證明的。而且，這假定根本就抹煞了加以詳細研究的必要。若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假定的話，不如先認為文化並不是到處都相同的；因為是不相同，所以我們推究它們不同的地方；而同時，亦不敢隨意接受不是從本土事實中歸納出來的結論。這樣我們可以不必和人家爭論中國文化現象是否尚處在封建階段或是半封建階段，我們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國名詞來形容中國事實，我們先得實地詳細它。<sup>①</sup>

他認為，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從中國自身發展的實際入手，而不是用外來的概念來解釋中國的事實；外國的理論是基於國外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實際提出的理論解釋，不能簡單套用於中國的發展實際。這種把外來理論和文化通過對中國的實地研究加以解釋並修正的思維，推動“現代中國社會派”的學術研究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 （三）“現代中國社會學派”是一個學術共同體

伴隨着對西方文化模式的反思，從實地研究的角度認識中國社會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基本選擇，“到實地去”成為獻身於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一個信仰。1933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社主辦的《社會研究》發表了一個宣言，聲稱：

社會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挽救這沉淪之中的中華民族，我們以為任何可以實行的方案，其規定的辦法，一定要根據以明瞭的事實……社會改革的方案若不根據於廣博的社會知識，其造孽的程度將遠於小匠造大屋。但這一點卻常常被人忽略了。<sup>②</sup>

這一宣言，可視為“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的成立宣言。而《社會研究》，主要是由林耀華、費孝通、黃迪、廖太初（1910—2000）等人負責，他們都是吳文藻的學生。

1990年初，筆者拜訪了吳文藻的夫人謝婉瑩（1900—1999，筆名“冰心”），在談到吳文藻時，她自豪地說，吳文藻有四隻“狗”，即他的四個學生費孝通、林耀華、黃迪、廖太初都出生於農曆庚戌年（狗年，1910）。吳文藻早年就學於清華學堂，曾參加過五四運動，後留學美國。他一方面“循規蹈矩地接受了外國科學的那一套”<sup>③</sup>，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又在國學大師梁啟超（1873—1929）等人的指導下學習社會學，積累了豐富的國學知識並熟悉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這樣的訓練，為他後來採用中西結合的方式研究中國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吳文藻年長費孝通九歲，費孝通在燕京大學期間“讀了他（吳文藻——筆者註）書架上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書”<sup>④</sup>。1952年，國家對高等學校的院系設置進行調整，吳文藻與潘光旦、費孝通被調入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成為同事，後來又一道研究和翻譯世界史。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吳文藻、費孝通等人已認識到，探索國家與民族的前途與出路，必須從國情入手，因此，他們呼籲：“在中國現在的局勢下，我們怕是即使人人都有熱烈的情感和忠摯的態度，要改造中國，單因了對於中國社會沒有正確和充分的認識，會將達到和希望相反的結果。所以，我們覺得中國社會科學的重要。”<sup>⑤</sup>這重要性，就是認識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吳文藻為首的燕大社會學社彙集了一批有志於獻身中國社會研究的年輕人。社會學社雖不是一個正式組織，卻是一個由有着共同志向、向心力極強的群體，這一點可以從費孝通到瑤山和“江村”，李有義到山西，林耀華到福建，廖太初到河北的行動中看到。《社會研究》發表的《送行》一文中寫道：

原野是最可愛的地方，是我們問題的所在，簡單結實，那些從前祇讓太陽和月亮照到

① 費孝通：“倫市寄言，關於實地研究”，《益世報》，1937-03-10。

② 社會學社：“我們的自白”，《北平晨報》，1934-01-10。

③④ 吳文藻：《吳文藻自傳》（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未刊稿）。

⑤ 社會學社：“送行”，《益世報》，1936-08-26。

的社會事實，現在都在你們手下讓你們支配了。世界祇有一件事情最樂，發現事實，發現真理，留在後方的人祇感到一股酸味兒，恨不能和你們攜手同行。

這次行程不叫你們去遊山玩水，更不是請你們去欣賞自然，簡單說是盼望你們在自己的社區裏發現了人群共同生活的通則原理，人和人、人和環境的一切關係。

風嘯嘯，雨茫茫，願你們各自保重，請記得，沒有苦，沒有汗，拿不出成績，不要你們回來，不認識你們，也無須再見。<sup>①</sup>

或許可以將《送行》視為中國社會科學史上的一首壯歌。如果說，在1935年以前，“到實地去”還是一句口號，那麼，從1935年起，這個口號在社會學社變成了實際行動，並逐步變成了一套系統的社區研究計劃在實地中付諸實施。人們各自在自己的田野中做出了成績：除了王同惠（1910—1935）的《花藍瑤社會組織》、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外，林耀華在實地中寫出了《福建的一個民族村》，楊慶堃寫出了《山東的集市系統》，徐雍舜寫出了《河北農村社區的訴訟》，廖太初寫出了《汶上縣的私塾組織》，李有義寫出了《山西的土地制度》，等等。到達英國後，費孝通依然與社會學社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止。後來，費孝通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到實地去“是我們認為最正確的求學之道。這一點也許和我國傳統的見解不十分相合”<sup>②</sup>。

## 二 國際社會學與“現代中國社會學派”

### （一）社會學家派克及其中國之行

193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派克（R. E. Park, 1864—1944）訪問燕京大學並發表學術演講。在講學期間，他聲稱自己是個“唯實論者”<sup>③</sup>。“唯實論”（Realist）是與“唯名論”（Nominalist）相對立的認識方法，後者堅持人們認識事實必須從事實的概念入手，而唯實論者則認為祇有從事實的實體入手纔可能獲得真正的知識。派克是從新聞記者開始其社會學家生涯的，這就決定了他的思想特點和學術風格是從體驗入手來瞭解社會及其事實。由此，他與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吉丁斯（F. H. Giddings, 1855—1931，一譯“季亨史”）發生了分歧，產生了二十世紀初美國社會學方法的兩大派：以吉丁斯為首的重統計分析的哥倫比亞學派，以派克為首的重體驗的芝加哥學派。派克注重個人的直接經驗和經驗的交流，認為“凡是經驗到的都是真實的，凡是交通的經驗都是科學”<sup>④</sup>，“這種態度就是詹姆斯之所謂過激的實驗主義，所以他的方法，還是由他們的根本觀點上發生的”<sup>⑤</sup>。

派克1889年曾留學德國，就讀於腓特烈-威廉大學（Friederich-Wilhelm），在那裏他選了第一門課——社會學，教授是齊美爾（G. Simmel, 1858—1918）。在齊美爾全部方法論中，實際上包含了兩個相反的方法：一方面是反對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社會，主張用直覺和經驗的方法研究人類行為；另一方面又主張用歸納的方法研究社會，使社會學成為歸納的科學。派克還選修了齊美爾的倫理學和十九世紀哲學。後來，他又師從文德爾班（W. Windelband, 1848—1915）學習哲學並隨其轉入海德堡大學。文德爾班是狄爾泰（W. Dilthey, 1833—1911）的學生，與狄爾泰一樣，文德爾班也堅持社會科學的人文方法，並且影響了馬克斯·韋伯（M. Weber, 1864—1920）。派克在文德爾班的指導下，從事社會學方法論的研究，並深受後者影響，後來他寫成的博士論文《聚眾與公眾：方法學與社會學研究》便是一部在德國“領悟”思潮影響下產生的方法論著作。

晚年費孝通又專門研讀了派克的傳記和著作，自稱為“重溫派克社會學”，並且不無深情地說道：“在我的學術生命裏，‘派克來華’原也是一件偶然的巧遇，並不是我早就預料到的。但回想起來，這卻是一件對我的一生起着關鍵作用的事。”<sup>⑥</sup>這個關鍵作用，既表現在早期

① 社會學社：“送行”，《益世報》，1936-08-26。

② 費孝通：“關於實地研究”，《社會研究》44（1937）。

③④⑤ 費孝通：“社會學家派克論中國”，《再生》1（1933）。

⑥ 費孝通：“補課札記——重溫派克社會學”，《費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第15卷，第136頁。

派克引領他深入社會現實，也表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恢復和重建社會學，主張建立“邁向人民的社會學”。

### (二) 人類學家布朗與燕京大學的中國社區研究計劃

費孝通和王同惠赴廣西調查後不久，功能派的一位首領拉德克利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 1881—1955）來燕京大學講學，對中國的實地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在這期間，燕京大學社會學社在《社會研究》上撰文，對今後的實地研究提出了設想：“以提倡現代社區的實地研究為標誌……考察社會事實，應採取功能的觀點，有機的和動進的看法”<sup>①</sup>；一是“想來貫徹這種主張”，二是“推進這個既定的方針”。<sup>②</sup>實地研究是社會學社幾年前就確定了的努力方向，布朗來華所講授的功能派觀點及對中國社區研究的建議，對社會學社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社會學中國學派的基本理論就是：以瞭解中國社會為宗旨，採用功能主義的方法。

### (三) 馬林諾斯基的功能主義思想

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期間，費孝通主要是參加了馬林諾斯基主持的“每星期五下午舉行的‘席明納’”<sup>③</sup>。所謂“席明納”（seminar），即通過“席學、明辨、納新”的教學模式來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費孝通將它類比為“人類學的前沿討論會”。瞭解馬林諾斯基的某些思想，可以從一個更大的背景來觀察費孝通關於體察方法的形成與意義。在馬林諾斯基的學說中，社會事實被當作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並且被分為兩類：<sup>④</sup>一類是可估量、可見的社會事實，諸如人口、地形、人口分佈、所有權等。這類事實僅僅是對部落制度和 cultural analysis 作出粗略的概述。另一類是不可估量的社會事實。在馬林諾斯基看來，人類學家的真正任務是要分析生活中的不可估量的事實。主要有：說話的腔調，交談時的氣氛——敵視和友誼的強烈程度，人們之間的同情與厭惡，虛榮心，等等。這些看不見的事實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它像無數細線將家庭、村落串聯起來。基於對社會事實的分類，馬林諾斯基將研究方法也分為兩類：一類是數量分析。他並不是一個否定數量分析的人類學家，而是一個基於社會事實類型採用不同方法的人。另一類是對被研究對象內心世界的分析。他要人類學深入到被研究對象的內心，在與交談者一起生活中，瞭解人們的態度、心理變化。眼下沒有材料可以證明馬林諾斯基受到了德國社會學的影響，但至少可以認為他受到弗雷澤（J. G. Frazer, 1854—1941）的影響。晚年費孝通回憶道：“如果說馬老師是在二十世紀初年手執功能學派的旗子，插上英國人類學的領域，成為這門學科老一代的接班人，傳遞這根接力棒的，我想說，正是當時高居在這角文壇上的大師 Sir James Frazer。”<sup>⑤</sup>但弗雷澤的新人文主義，也受到了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É. Durkheim, 1858—1917）的批評。

## 三 費孝通在“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創立時期的思想

### (一) 費孝通早期研究方法的階段性特徵

費孝通是在大革命失敗之後開始其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術生涯的。儘管他有許多顯著的個人特徵，但在總體上仍屬於“轉變的一代”。

費孝通的實地研究問題的思想形成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0年特別是1932年派克來華至1936年初。這是費孝通的實地研究理論的確立時期，主要包括“討論中國社會問題的人能多做切實研究工作而少作理論上的空談”<sup>⑥</sup>“空口談民

① 社會學社：“我們的自白”《北平晨報》，1934-01-10。

② 吳文藻：“中國社區研究計劃的商榷”，《社會研究》1（1936）。

③ 費孝通：“讀馬老師遺著《文化動態論》書後”，《從馬林諾斯基到費孝通：另類的功能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謝立中主編，第75頁。

④ [英]馬林諾斯基：“文化論”，《費孝通譯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上冊，第197—206頁。

⑤ 費孝通：“從馬林諾斯基老師學習文化論的體會”，《從馬林諾斯基到費孝通：另類的功能主義》，第9頁。

⑥ 費孝通：“中國文化內部變異的研究舉例”，《社會問題》9（1933）。

族問題是沒有用處的”<sup>①</sup>等觀點，以及客觀知識的獲得“一定要主觀的深察體會”<sup>②</sup>的方法，主要表述在《社會學家派克論中國》《人類學幾大派》《派克及季亭史二家社會學學說幾個根本的分歧點》《親迎婚俗之研究》《分析中華民族人種成分的方法和嘗試》《中國文化內部變異的研究舉例》等論文中。

第二個階段從1936年起到1937年底。這個階段，費孝通明確地提出了對“社會研究有堅決的信仰”<sup>③</sup>，並對社區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費孝通關於實地研究的基本理論與方法的闡述，不同於那種社會理論形成於實地研究之前，而是在經歷了兩次實地研究之後。從廣西的瑤山回到北平之後，他寫下了《社會研究的關鍵》《論普遍與特殊》《社會研究能有用嗎？》《寫在〈汶上縣的私塾組織〉的前面》等論文。從江村來到英國後，他又寫出了《理論與實地研究》《關於實地研究》《關於〈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的通訊》等。事實上，在進入瑤山之前，他已經初步探討了實地研究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其要點是體察以及體察方法與統計分析的關係。

1936年春夏，在讀了廖太初的《汶上縣的私塾組織》後，費孝通寫道：

我讀了太初的《汶上縣的私塾組織》，更使我對社區研究有堅決的信仰。我們覺得這一篇文章不但證明了我們所有方法和觀點可以用來研究任何社會現象，而且覺得正確地瞭解任何社會現象，我們的方法和觀點也是最有效、最切實的。<sup>④</sup>

廖太初使用“功能的觀點來實地研究一個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私塾。所謂功能的觀點，就是把教育看做一種社會功能，教育制度看做相互關聯的社會制度之一，它的生長、存在和變化是處處和整個社會相呼應的”<sup>⑤</sup>。費孝通認為，中國除了私塾以外，其他現象，諸如信用合作、地方行政等，也可以如此方式進行研究。<sup>⑥</sup>

費孝通關於社區研究的觀點是在英國留學期間纔成熟和完善起來的。在談到《江村經濟》時，馬林諾斯基說：它旨在說明構成江村農民消費、生產、分配、交易的經濟體系與江村特定的地理環境的關係，“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係”。<sup>⑦</sup>費孝通認為，社區研究，甚至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要有“一個綜合的，實地的，對於中國的文化現象的認識”。<sup>⑧</sup>在這裏，他提出了中國社區研究的“發展方向”，也是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他指出，“綜合的是和分科專門的、各不顧各、片面的相反”，即提倡多種學科之間的相互協作；“實地的，是和憑空捏造的、抄襲的、不足考實的、雇傭‘勞工’間接搜集資料相反”。<sup>⑨</sup>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是：“須在一個較小的區域中作較久的及較密切的體悉，不多走路、多看碼頭是不成的。”<sup>⑩</sup>由此也可以理解，在其晚年他何以“行行重行行”。

## （二）費孝通與燕京社會學社

燕京大學社會學社這個學術團體影響了費孝通，費孝通也給這個團體注入了生機，“他的繼續不斷的努力成了同人興趣的中心”<sup>⑪</sup>。社會學社讚譽他是“一隻陷阱壓不死的活老虎，到處給人奇特和驚奇，他的能力是我們早已知道的，還有那看不見的能量，朋友們都敬重他”<sup>⑫</sup>。由此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費孝通和他所處的社會學共同體的意義。這個社會學共同體，既影響了費孝通個人，也影響了社會學的發展。理解這個共同體的目標、氣氛，是理解費孝通思想風格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十世紀末年，在回顧自己幾十年走過的路程時，費孝通說道：

我對於中國的社會調查在中國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即用實證方法、通

① 費孝通：“分析中華民族人種成分的方法和嘗試”，《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4-10-17。

② 費孝通：“社會學家派克論中國”，《再生》1（1933）。

③④⑤⑥ 費孝通：“寫在《汶上縣的私塾組織》的前面”，《天津益世報》，1936-08-12。

⑦ 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第3頁。

⑧⑨⑩ 費孝通：“倫市寄言，關於《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的通訊”，《天津益世報》，1937-02-10。

⑪⑫ 社會學社：“送行”，《益世報》，1936-08-26。



過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直接接觸中吸取研究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進而按照自己的認識想方設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對於自己發展道路的理解。<sup>①</sup>

這也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覺”的思想。他在2002年寫道：

我在提出“文化自覺”時，並非從東西文化的比較中，看到了中國文化有什麼危機，而是在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實地研究中首先接觸到了這個問題。<sup>②</sup>

這裏的“少數民族”思想，可以追溯到他的廣西大瑤山調查。對於瑤山習俗的解釋，表現出他功能主義的傾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其實有着功能主義的思想淵源，“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對功能主義思想的超越。

### （三）費孝通早期的理論探索

費孝通的第一篇社會學論文是介紹派克與吉丁斯的，即《派克及季亭史二家社會學學說幾個根本分歧點》。文中有一部分專門探討二者的方法：“季亭史重統計，而派克認為統計方法不足以完全解釋社會現象，故重個例方法。”<sup>③</sup>費孝通認為，吉丁斯和派克在方法上的分歧，導源於他們的社會觀。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費孝通對派克情有獨鍾。他寫道：

派克並不是要排斥統計方法於社會學之外，祇是認為統計方法決不是社會學的唯一方法。社會學的對象即在社會態度，而社會態度是變動不居，沒有一個不變而一致的單位可得，自然無從統計。於是他提出個例方法，尤其是個人自述經歷視為社會學最寶貴的材料。<sup>④</sup>派克之所以注重個例，是因為“個人生存社會中，一切行爲和態度都在不自覺地態度中發現出來”，“這種個人平時不自覺的態度是社會所共有的。個人祇是一般的例子。在一個人的自述中，就能得到同一社會中一般人的態度了。所以，個例研究並不是個人主義者的研究方法”。<sup>⑤</sup>費孝通認為：“統計方法是在求許多個體中的多數，個例方法是在從一個人的自述中發現一般的態度。前者纔是最個人主義的方法，後者實是集合主義者的方法。”<sup>⑥</sup>在費孝通看來，派克的方法是獲得知識的有效途徑，“因為他所給人們的不是普通的知識而是生命，一種能用以行動的知識，這種知識並非單由客觀的描摹可以獲得，一定要有主觀的深深體會纔能得到，所以我說是生命”。<sup>⑦</sup>對此，美國衣阿華大學歷史學教授戴維·阿古什（R. David Arkush，漢名“歐達偉”）評價道：“正是派克將費孝通從圖書館解脫出來。”<sup>⑧</sup>不管他說的是否準確，但至少費孝通承認，派克有一種魔力，這種魔力“能把他的學生從書本上解放出來，領到一個活的世界中去領悟人類生活的真相，這是他在社會學界中樹下百年基石的工作”。<sup>⑨</sup>派克的魔力不僅表現在他訪問燕京大學期間和對燕京大學師生的影響，也表現在芝加哥大學；在那裏，他同樣激勵他的學生和同事到實地中開展社會學研究。他獨特的經歷，使其社會學理論也盡顯特色。<sup>⑩</sup>

1933年下半年，在《楊寶齡的〈美國城市中俄籍摩洛哥之客民〉》一文中，費孝通將派克的個例方法作了進一步發揮。首先，他認為文化的研究不可能全部採用統計方法，尤其是不能用統計方法推測社會的內部結構：“由統計推測社會內部時，就有種種困難，因為要從甲推測乙，先就需要肯定甲與乙的相關係數，而這種相關的甲與乙若有一是不能以數目表示的時候，分數就無從確定。”<sup>⑪</sup>其次，許多甚至大部分社會事實是統計方法無法測量的：“社會生活中有很多，甚至最重要的地方是無從統計的，因為統計需要不變的單位，而社會現象中要求到這些單位是不容易的，有時是不可能的。”“如社會態度、人生理想的變遷祇能加以描述，而決不能歸原於可統計的單位。”<sup>⑫</sup>這裏隱含了費孝通的一個重要觀點：以個體為分析單位的統計方法，與以整體為單

①② 費孝通：《費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第13卷，第36頁。

③④⑤⑥ 費孝通：“派克及季亭史二家社會學學說幾個根本的分歧點”，《派克社會學論文集》（北平：燕京大學出版社，1933）。

⑦ 費孝通：“社會學家派克論中國”，《再生》1（1933）。

⑧ R. David Arkush,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32.

⑨ 費孝通：“社會學家派克教授論中國”，《費孝通文集》，第1卷，第125頁。

⑩ George Ritzer, *Contemporary Sociology Theory and its Classical Roots: The Basics* (McGraw-Hill, 2003), 61-62.

⑪⑫ 費孝通：“楊寶齡的《美國城市中俄籍摩洛哥之客民》”，《費孝通文集》，第1卷，第100，100—101頁。

位的人的行為和態度分析方法是衝突的，因而採用計量個體的統計方法來分析集體行為是不可能的。他的方法與他的社會觀保持了一致性。

費孝通是在廣州得知布朗來華講學和社會學社社區研究計劃的，他在致林耀華的信中寫道：“最近纔聽到燕京有民族學方面發展的計劃，——若是同惠遲死一月，她要多少快活呢？”<sup>①</sup>吳文藻把功能方法規定為社區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提出：社區研究是“在一個特殊社區之內，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密切的相互聯繫，而為一個整體，或體系中的各部分，在研究任何一方面，必須研究其他各方面的關係”；“這就是說，每一種社會活動都有它的功能；而且祇有發現它的功能時，纔能瞭解它的意義”。<sup>②</sup>後來，費孝通寫道：“關於社區研究的名詞的好處和意義已有吳文藻先生幾篇文字的解釋，我想大家一定是有瞭解的。”<sup>③</sup>吳文藻倡導的中國社區研究計劃對費孝通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社區研究方法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吳文藻是他們的精神領袖。費孝通和他的同學踐行了社區研究的方法，“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從其產生起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學術共同體。

費孝通堅持體察方法的另一個動因是他的社會整體觀。他認為，在社會尤其是文化研究中，祇有將社會與文化當成一個整體，深入其中體悉，纔能客觀地描述它。他寫道：

當一個生長在社會變遷率較高地方的研究者，到一個和西洋文化接觸較疏遠的社區中去，因為當地的變遷率較低，積久傳統下來的社會制度經長期調適，他很自然會發生“結構微妙”的欣賞態度。這對於研究者沒有什麼妨礙，因為在社會研究的第一步工作是在發現文化部分間的關係，和它在這個體系中的地位。<sup>④</sup>

費孝通在這裏已經將體察的方法引申到如何來理解一個體系及其結構關係的層次上，從而也使得問題變成了方法論的問題。從這個方法論問題上，又可聯繫到迪爾凱姆與韋伯在兩種研究方法上的爭論，即現代社會學中的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之爭。以反實證主義著稱的韋伯主張，社會研究的目的是在於理解被研究對象的意義。韋伯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區別，前者旨在外部的、事實的描述和因果律的解釋，後者則是與對文化現象的內在意義的移情的、直覺的理解。迪爾凱姆是早期實證主義的最大代表，在社會學研究中，他另闢蹊徑，即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提並論，致力於所有科學的統一，他反對內省理論，認為內省是個人意志的、主觀的，個人內省僅限於心理現象、精神性，而無法瞭解社會事實的超精神性。在早期的學術活動中，費孝通曾專門研究各派心理學中的內省問題。<sup>⑤</sup>這說明，費孝通對貫穿於社會研究方法論中的基本問題早就注意到了，而且做了深刻的思考和研究。他也曾考察過這兩種方法的淵源。<sup>⑥</sup>

## 結 論

現代中國社區研究始於實地中的個案研究，始於“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發起的對廣西、山東、江蘇、山西、福建等地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經濟、教育實地調查。這種調查“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sup>⑦</sup>，後來被馬林諾斯基的學生弗雷德曼（M. Freedman, 1920—1975）稱為“微型社會學”，專指馬林諾斯基所說的“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在中國社會學界，也有人稱之為“社會學調查”——強調社會學的專業性，發現社會的基本規則和原理，堅持體察和定性分析，通過社會變遷瞭解社會現狀等等，以區別於一

① 費孝通：“關於悼念同惠的通訊”，《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6-01-12。

② 吳文藻：“中國社區研究計劃的商榷”，《社會研究》1（1936）。

③ 費孝通：“倫市寄言，關於《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的通訊”，《天津益世報》，1937-02-10。

④ 費孝通：“從社會變遷到人口研究”，《天津益世報·社會研究》，1937-04-04。

⑤ 費孝通：“內省與意識”，《天津益世報》，1934-04-23。

⑥ 費孝通：“派克及季亨史二家社會學說幾個根本的分歧點”，《派克社會學論文集》。

⑦ 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第4頁。

般的“社會調查”。<sup>①</sup>費孝通和王同惠的瑤山調查，奠定了現代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基石。社區研究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個學術共同體——燕京大學社會學社以探索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為己任在實地中的學術實踐。

“現代中國社會學派”把人類學和社區研究的方法用於研究現代社會——“文明人”，尤其是由於全球化導致的中國在一個世紀中的磨難與奮爭，從而突破了自弗雷澤到馬林諾斯基以來人類學專注“土著民族”的研究方法和風格。在全球視野中審視中國的一個個村莊及其社會變遷，這也恰恰是馬林諾斯基所欣賞的和稱之為“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的重要緣由。從弗雷澤、馬林諾斯基到“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再到當代人類學，是一個人類學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不斷擴大、不斷創新的過程。在二十一世紀，人類學聚焦全球變遷和全球化轉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語言、種族和種族主義、民族和民族主義、性別、親屬家庭和婚姻、階級和不平等、全球經濟、政治和權力宗教、健康和疾病等等，<sup>②</sup>“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在這個進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中間人和過渡者的角色。

“現代中國社會學派”因全面抗戰爆發和其成員的變動而發生變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費孝通繼續高舉實地研究的旗幟，在抗戰的大後方雲南一帶履行其使命。這個時期，費孝通將其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講授課程的講義編寫成了《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領導了雲南的實地研究，寫出了《雲南三村》等著作。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復校，費孝通與清華大學的師生學習、研討，編寫了《中國士紳》等。1979年，受中國領導人委託，六十八歲的費孝通受命恢復社會學，他提出了“邁向人民的社會學”和“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學科建設方針，指導了“小城鎮與城鄉一體化”、邊疆民族地區開發等重大問題的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在深入文化反思的基礎上，費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覺”的思想，大大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內容。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科建設，都可以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現代中國社會學派”中看到其蹤影。

① 韓明諤：“中國社會學調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論發展的三個里程碑”，《從馬林諾斯基到費孝通：另類的功能主義》，第233頁。

② Kenneth J. Guest, *Essential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Toolkit for A Global Age* (W.W. Norton & Company, 2016), Preface.